

譯者序：龍獅之舞

思考現代西藏問題時，大眾都會把注意力集中到1959年的拉薩事件。誠然，拉薩事件標誌着現代西藏命運的全然轉折和切換，拉薩舊政府和政治制度退出西藏政治舞台，中國共產黨政府以西藏自治區直接管理西藏。然而，從學者眼光來看，他們研究更多的是這一悲劇事件為何發生，有何前世因緣。戈爾斯坦已經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西藏現代史》四卷本即是圍繞這個方向逐步展開：其中第一卷《喇嘛王國的覆滅》起自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藉清末民初之機着手獨立管理西藏，迄止1951年人民解放軍進藏；第二卷《暴風雨之前的平靜》記錄了1951年到1955年暗潮洶湧的平靜期，止於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進京參加人民代表大會，中藏關係達到高點；本書則覆蓋了1955年到1957年短短的兩年時間，此期間的西藏局勢，大開大合，頗有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戈爾斯坦原計劃在第三卷結束整個系列，後來卻發現史料太多，因而改變計劃：

我起初計劃本卷——卷三——敘述剩下的時期（即1955-1959），但是當我開始寫作後，很明顯中藏雙方出現了太多新材料，我無法將它們壓縮到一卷之中，因此我決定將這段時間分為兩卷。

康區叛亂

回顧歷史，研究者們最想搞清楚的問題，是為何達賴喇嘛領導的西藏政府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政府無法在《十七條》的框架下合作。一般認為，1955年春天開始的康區叛亂及中國政府的應對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西藏歷史的走向。本書圍繞着康區叛亂對此作出了詳盡的描述，試圖用充分的史料說明這一問題。

在中國一方，人們不明白，為甚麼中國共產黨在西藏和四川藏區（西康）有那麼大的行為差異。這一區別集中體現在黨內毛澤東—鄧小平—李井泉/張國華的政策主線上。毛澤東—鄧小平—張國華決定在西藏繼續採取爭取達賴喇嘛和拉薩上層的懷柔政策，對范明的民主改革實驗進行大下馬和大收縮。但是，同屬西南局的鄧小平—李井泉聯線卻在康區執行左派激進政策，在條件未成熟的情況下推動康區的民主改革。在具體執行中，他們忽視了藏族幹部天寶和統戰部劉格平的意見，點燃了整個藏區形勢惡化的火藥桶。毛澤東也同意了這一路線。戈爾斯坦分析鄧小平在這些決策中的核心作用，他試圖從私人關係的角度解釋：鄧小平與部下李井泉私交甚篤；卻與統戰系李維漢個人交惡。戈爾斯坦不無遺憾地寫道：

假如鄧小平選擇強烈勸說毛澤東，李井泉現在完成改革是錯誤的，相反，他建議為了結束叛亂，穩定整個青藏高原的局勢，最好將甘孜與西藏的藏人一樣看待，他的觀點也許可以佔上風，西藏歷史也許會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在另外一方，達賴喇嘛同樣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巨大的轉變。受到甘孜地區事件和他身邊人的影響，1955年從北京返回拉薩的達賴喇嘛，到1956年底跨入印度領土時，其樂觀情緒已經蕩然無存，而再次寄望獲得印度的支持進入流亡。在此之前，據戈爾斯坦研究，

他還不了解其親信帕拉暗地裏從事的反華活動。然而，達賴喇嘛在印度並未獲得他哥哥嘉樂頓珠所以為的支持。印度總理尼赫魯對達賴喇嘛的計劃嗤之以鼻，並勸說達賴喇嘛返回拉薩與中國人合作。經過一番猶豫的達賴喇嘛最終回到拉薩，但是與尼赫魯想像的不同，這是一個從組織上和思想上都做好準備與中國人抗爭並決裂的達賴喇嘛。何時決裂只不過是早晚的問題。

戈爾斯坦主要利用夏格巴日記描述此時期哲堪孜松的活動。戈爾斯坦的敘述反映，哲堪孜松，特別是嘉樂頓珠，對國際政治的複雜缺乏了解，把自己的願望和外界（包括印度和美國）的正式承諾混為一談。而藏人精英的這一認識，從那個時代，到1959年，一直延伸至今，阻礙了他們尋找一個現實的解決方案。

這一卷中花了相當大的篇幅描述阿樂群則的人民議會活動和恩珠倉等康巴人的活動。戈爾斯坦「發現」了一些歷史細節，人民議會的最初主意實際上是來自於一些噶倫（索康、柳霞和夏格巴等）的討論和授意。在理塘，中國開始準備實施民主改革，並開會向一些藏族上層傳達計劃之後，聚集在理塘寺的藏族人開始叛亂，打響了第一槍。而阿樂群則的活動在拉薩受到限制之後，他逃到噶倫堡，卻發現哲堪孜松根本不重視他和他的活動，完全把他屏蔽在內層決策之外（無獨有偶，戈爾斯坦另一本書的主人公扎西次仁曾經在噶倫堡遭遇類似的待遇，因此離開印度去美國求學）。

五一四指示

筆者認為，理解中國政府對四川和西藏不同政策的核心在於《五一四指示》。戈爾斯坦在書中全文引用（甚至包括未公開出版的部分），但是他似乎沒有對這份指示的核心作用予以足夠重視。

首先，雖然在《十七條協議》中，雙方僅僅含糊地約定，「十一、

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但是，對於理想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來說，西藏和整個藏區必須進行民主改革，這是毫無疑問的，也是不可妥協的。《五一四指示》開篇即說，「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遲早一定要實行的。西藏人民必須經過民主改革，才能獲得政治的和經濟的解放，造成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

在這一前提下，指示對局勢進行了細緻深刻的分析：「西藏……對祖國實際上保持着一種獨立或者半獨立的狀態。（這一段話在中國公開出版時被刪去）」對於共產黨政府來說，處理這種現實和理想的背離的方式，是按照不同情況實施不同政策；使用因材施教的手法，在康區採取不同於中國內地的政策，在西藏採取不同於康區的做法。採用這種做法，在不同地區中保有了一定的張力，一方面體現政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也為政策的發展作準備。

不熟悉中國共產黨生態和歷史的人往往不能理解其歷史上看似在同一原則下反復出現的左右路線之爭。主導政策走向的是上述黨內高層經過爭論形成的共識，而不是戈爾斯坦所猜測的私人關係。在所謂的民主集中制下，一旦討論通過，中央需要省部級官員按照指示執行。具體在西藏的情勢下，平汪太右、范明太左，他們都因為對指示陽奉陰違搞小動作而被清除，離開了政治舞台。

在西藏政府這邊，阿沛和索康兩人都意識到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決心，然而兩人作出了不同的反應。阿沛認為西藏必須自己起來改革，「自己做的帽子適合自己的頭。」而索康對前途悲觀，開始着手把家人財產都轉移到印度去。除非所有人都能逐漸順應社會主義道路或自動離開，否則衝突是無可避免。

治史之道

戈爾斯坦曾經在《現代西藏史·卷一》前言中稱，「本書所持的觀點是既不親藏也不親漢，即既不傾向於達賴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邊」，而在本卷前言中，戈爾斯坦隱晦地批評夏格巴，並重申他自己的治史原則：

已故致本夏格巴是現代西藏歷史和政治偉人之一，他曾經跟我說，不要書寫任何損害「西藏事業」的文字。……最後，我希望在一個新的細微和複雜的層面上闡明1950年代的歷史，但是以一種平衡的方式，而不考慮這些資訊將如何影響當前有關西藏與中國有關的政治地位的衝突，也無論部分資訊是否與人們固有的理念或認知相矛盾。

在一個高度爭議並嚴重影響當代政治走向的領域進行歷史研究，要達到一種平衡無疑是困難的。有批評認為戈爾斯坦是親中共的宣傳家，認為他修改其觀點，以換取進入中國進行研究的機會。在我看來，在這無法得到充分資料的領域，戈爾斯坦的重要貢獻在於以盡可能多的史料呈現歷史的原貌。戈爾斯坦並非沒有自己的觀點，但是他站在觀點背後，讓史料來說話。所以，儘管有人不同意戈爾斯坦的觀點，但是他的現代西藏史系列卻成為這個領域中得到眾多引用的巨著。

戈爾斯坦的歷史敘述和分析常常讓我想起精於考證的中國歷史學家陳寅恪——引用史料而不拘泥於史料。達賴喇嘛剛剛進入錫金就遇到了國旗事件。書中引用了達賴喇嘛自傳中對這事件非常幽默的敘述，並認為這是中國人可笑的過度反應。戈爾斯坦精妙地分析道，「無論中國還是印度官員更換旗幟，這不是個笑話，通常對於禮儀非常敏感的達賴喇嘛當然知道其代表意義，……然而，這一次他不在乎中國人的感受，因為他基本上已經決定進入流亡。」

本卷前言中，戈爾斯坦談到他對相互矛盾的史料的處理方法，其中甚至包括對象與事件的關係，以及對象的名聲。例如，在幾處非常重要的事件中，戈爾斯坦選擇相信達賴喇嘛的話，因為他「本質上是個謹慎的人，我相信他。」我起初對於這些判斷表示懷疑，但是在閱讀更多材料後傾向認同這種判斷。當然，從中方角度看，一個事件達賴喇嘛知情，或者他不知情而他的親信知情，事情的性質並未有太多改變。與之相比，在處理與嘉樂頓珠或范明有關的史料時，戈爾斯坦就謹慎得多了。

舞向未來

傳統中華帝國向現代中國的轉變是個痛苦、漫長、光輝的過程。這個轉變在21世紀的今天是否結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滿清帝國是一個充滿統治智慧，以多種層級（朝貢、外藩、內藩、行省）組成的混合治理國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上是一個大一統式的中央集權式國家（香港、澳門除外）。中國目前仍然面臨着臺灣這一治權爭議，而在內部，香港、新疆、包括西藏都還存在不安因素。希望1951至1959年的西藏歷史能夠給後來人一些啟示。

在本卷的末尾，當達賴喇嘛1957年最終回到拉薩時，他如是解釋他的決定：

與中國的關係會被切斷，你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同時，你完全無法在這兒得到幫助。……如果我們在這兒得到具體的完全的支持，那值得與中國為敵。但是如果你們無法在這兒得到支持，那麼你們與中國為敵而一無所獲。所以，最好是回去，通過策略性的方法，或聰明的方法，通過其他一些方法來行事。

回顧過去幾十年的歷史，這一段話令人心酸。我們是否再次站在崩盤的邊緣？中國、達賴喇嘛、美國、印度將如何處理當前的複雜局面？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如何描繪目前的歷史？

翻譯規範和致謝

筆者的翻譯宗旨是盡量反映原作者戈爾斯坦的原意，幫助中文讀者跨越語言的障礙。所幸戈爾斯坦對此相當理解，對於我的問題有問必回，他和學生李翼盡可能地提供了很多幫助。希望這本譯文能夠不辜負英文版的高水準，把這部巨著帶給中文讀者。

戈爾斯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文字料。我從他那兒得到了大部分原文。這部分原文有時和英文版語義有區別，那是因為英文翻譯的問題。引文中有可能不夠通順，或者使用詞字不規範的，一般保持原樣。但是有些中文訪問，戈爾斯坦已經找不到中文記錄了，所以我是從英文轉譯的。在尋找資料和某些人名時，我得到了西南民族大學秦和平教授的指教。秦教授對於這段歷史的資料和觀點也讓我受益頗深。

涉藏翻譯的一大難點是處理一些名詞的政治含義。例如對於“Chinese”的翻譯，我糾結了很久。英文中的Chinese本身即不區分中國人和漢族人，而原文中不少英文的“Chinese”是來自藏語的“བོད་མི་”（*བོད་མི་*）。如果翻譯成漢人，有時似乎在中國國內的語境中更加政治正確，因為這樣避免了西藏人、藏族人和中國人的並列關係；但是實際上也並非準確，因為像中國一方也有像劉格平這樣的非漢族官員。經過和戈爾斯坦的討論，我在大部分場合都翻譯成「中國人」。翻譯成漢人的情況包括：說話的人或者語境是中國政府、親中國政府；類似於新漢人、舊漢人、紅漢人這種已經約定俗成的說法；原文中的“Han Chinese”等等。另外，戈爾斯坦在書中所用“Tibet”一詞，和

多數英文書不同，指的是政治西藏，大致上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地域。但是在少數情況下，他也用這詞表示整個藏族居住地區，我按照意思翻譯成藏區。我在翻譯中未區分使用「藏人」、「藏族」等說法。希望讀者能夠理解，1950年代的西藏正處在被中國逐漸融合的過程，一些用詞如果嚴格界定可能不夠準確，但是能夠最方便地描述歷史情況。戈爾斯坦對於西藏的社會制度有過諸多方面的研究。在本書中，他選擇基本不使用“serf”一詞，而是使用“peasant”或者“bound peasant”。儘管農奴一詞有其廣泛的含義，西藏農民的生活與西歐莊園制度下的農奴有相似之處，但是由於中文農奴一詞使用了「奴」這個字，使人容易與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聯繫起來。經過和戈爾斯坦的討論，我使用了「農民」和「依附農民」來翻譯。而在許多來自中國一方的引文直接使用原文「農奴」；與之對應，戈爾斯坦在英文版中使用“serf”一詞來翻譯這些引文。

我在翻譯中對於英文人名，除非特別著名的，第一次出現時都用括號附注原文，例如：黎吉生 (Hugh Richardson)。藏語、英語人名、地名盡量採用已有的譯法。

作者戈爾斯坦是美國人，所以在書中多使用美制單位例如英尺、英里、英畝、磅等等；在部分引文中，把原單位換算成美制單位。為了中文讀者的方便，我在翻譯時直接換算成了公制單位如米、公里、公頃、公斤等等。

除了英文之外，英文版在標注藏語時使用了威利轉寫法 (Wylie Transliteration)。我直接使用了藏語。我希望有更多的書籍能夠混排漢、英、藏三語，以原本的方式使用語言是對藏族語言和文化的最大尊重。鑑於我的藏語能力有限，我請到了西南民族大學的旦知肖老師幫我進行了藏語校對。

我在翻譯某些引用部分時，參考了丁一夫先生翻譯、臺灣圖博之友會2010年出版《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和黃瀟瀟女士翻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一位藏族革命家》。感謝他們的譯作。

在今日的出版市場，能夠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本殊為不易。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對此的支持，以及葉敏磊、彭騰編輯及其同事的勞動。也感謝 Y. L. Peng 小姐幫助我製作了地圖的中文版本。我在此特別感謝我的太太 Pearl Z. 對我的寬容和支持。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